

冯玉祥

音乐爱好者 古筝演奏家

李士钊

冯玉祥先生一八八二年生于河北保定。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史上杰出的爱国民主将军。很多人都知道冯玉祥先生在军书旁午之余，能写文章、能作诗、会画画，能写隶书，会唱歌（从清末民初的军歌，爱国歌曲，太山民歌和抗战歌曲），还会打拳等技能，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能演奏民族乐器古筝的名手。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重庆天风琴社在菜园坝往下去的扬子江岸，靠近南纪门的一所旧式的庭院中开成立大会，事先我和杨大钧同志，曾专程到歇台子邀请冯玉祥先生，出席这次古琴界名家的《雅集》，他欣然的答应并准时到场了。出席那次大会的有：今虞琴社的古琴家徐元白先生夫妇和程午嘉、杨大钧。当时荷兰王国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高洛佩和他的中国籍夫人水女士。高洛佩是一位荷兰汉学家，在中国住过多年，学习中国的历史和语言都有相当成就。他能说道地的北京方言，能用毛笔写中国的楷字和行书，还能弹奏中国的七弦琴。于右任先生也出席了这次集会。东道主是古琴家杨绍武先生和他的女儿。还有几位四川古琴界的朋友。大家相继演奏了自己最熟练的名曲。徐元白先生演奏了古琴曲《普庵咒》。

冯玉祥先生那天带来自己用黑色木匣装着一具丝弦古筝，他演奏了《高山流水》。

冯玉祥先生的演奏，不论指法、技巧、节奏，表达能力和音乐的意境，都可以理解他在学习古筝的演奏过程中，是经过一番勤学苦练过硬功夫的。因之才能具有深厚的功力和修养。使在座的古琴家和音乐爱好者们无不四座皆惊，对他表示钦慕和赞佩。与会的朋友们热情地要求，他从容不迫自由自在地又弹了《平沙落雁》。他的记忆力很强，节奏准确，作为一位业余的古筝演奏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会后大家还一起照了像。

我曾请教冯玉祥先生古筝的演奏艺术是怎么学来的？他说：“我的老师是河南省南阳府的一位姓王的老道士”。

冯玉祥先生还是一位喜欢唱歌和很会唱歌的职业军人。一般清朝末年和辛亥革命后流传的爱国歌曲和军歌，以及他自己亲自厘定和作词的军歌（多数采用外国教会的赞美诗歌的曲调填词）乃至抗日救亡歌曲，他都能背诵如流，唱的节奏准确有音乐感。

冯玉祥先生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战失败到“九·一八”事变前后，曾一度在山东太安太山影息读书。一

九三三年夏季他在张家口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遭到破坏后，再次影息在太山有几年之久。和太山的农民群众，有着息息相关血肉相连的友谊。他能背诵太山民歌的一些曲调，他用这些民歌曲调填上几首描述樵夫、农夫、轿夫和洋车夫艰苦穷困生活的诗。这几首民歌的歌词是：

（一）樵夫的儿子：

“爸爸上山去打柴，从早到晚方才回来。
百斤柴来百里路，我得读书怎能发呆。”

（二）农夫的儿子：

“爸爸扶耒娘前拉，五谷种子才种地下。
天气焦旱雨不落，头肿牙疼二老急煞。”

（三）轿夫的儿子：

“爸爸抬轿上太山，终日劳苦牛马一般。
上山下山两身汗，我得读书怎能偷闲。”

（四）洋车夫的儿子：

“大哥拉车满街跑，终日劳苦洋三角。
拉夫一天几身汗，我得读书怎敢辞劳。”

另外有三首描述“九·一八”事变后所写的铁蹄下逃到关内来的青年儿女，思念父母在家受欺凌、受欺侮和逃荒要饭情景的民歌三首。名叫“爸爸在家”：

（一）“爸爸在家受欺凌，孩子们在外真是心疼。
一定打回老家去，救我同胞救我弟兄。”

（二）“爸爸在家受欺侮，孩子们在外真是痛苦。
一定打回老家去，救我同胞救我父母。”

（三）“父母在家正逃荒，孩子们在外真是心伤。
一定打回老家去，救我同胞救我爹娘。”

一九四六年二月，重庆的“较场口事件”后不久，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学生自治会负责人马润源，储声虹等同学，发现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到音乐院去看望一位陈老先生（教务主任陈田鹤的岳父）时，曾请冯夫人对全校学生作过一次时事报告。后来又托我邀请冯玉祥先生到校作一次有关时事报告，冯玉祥先生慨然应允。二月十七日，他用幽默生动的语言和丰富的政治内容发言，轰动了整个青木关学生界。除了国立音乐院的全体师生外，国立音乐院分院、国立劳作师范、国立童子军师范、国立中央大学附中；甚至连在璧山县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附中的进步学生们，也有些人都不期而至。报告会结束时，又对在场的爱国青年们演唱了他自己作词的太山民歌。先唱了“樵夫的儿子”等四首，声调哀惋，感情真实，吐字清楚，每一句话都深深打动青年听众的心弦。强烈地要求他再来一个，他又演唱了太山民歌“爸爸在家”。二月十八日《新华日报》刊登出来。题为“冯玉祥昨赴音乐院演讲和平建国问题。”

冯玉祥先生和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是多年的知己朋友。抗战期间陶先生在重庆北碚草街子办育才学校时，冯先生是一位有力的支持者。育才学校办了一个音乐组，由贺绿汀主持，培养天才的儿童。

著名抗日爱国名将张自忠将军，一九四〇年五月

冯玉祥先生遗作·

丘八歌与丘八

本文是冯玉祥先生1942年在重庆时所作，现作为历史文献重行发表以供读者参考。

编者

“丘八”这两个字在中国一般人脑子里是很难听的两个字；实际上，在进步的国家，当兵是人人认为荣耀的事。中国便不然了，社会上流行的歌谚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所以当兵的人被人鄙视，被人歧视。就是训练军队的人，过去也大多总把他们不当人看待，总是想着他们越没知识越好。抗战以来，才把这种观念打破了。

既然中国的丘八过去是处在那样的地位，所以丘八歌在军队中并不发达。差不多一支歌子，唱个十年二十年也不变样。现在不是还可以听见唱那“还有张翼德，当阳桥上登……”的歌吗？

我在书上曾经看到，戚继光亲自教士兵唱歌的事，也曾读过曾国藩编的许多军歌。我觉得这唱歌对于官兵的身心以及其他方面，都有极大的益处。所以我在训练军队的时候，自己编过许多歌子给他们唱，收到很大的效果。我且分条写在下面：

一、关于卫生方面

早晚的唱歌，可以使他们肺量扩张、精神愉快，混身上下可以得到由内向外的—种舒展。丘八唱歌不象少爷小姐唱着玩的。他们唱歌是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有时唱得头上的汗都有黄豆粒子那样大。这种全身肌肉血液的运动，能说对于他们的身体没有益处吗？

十六日在湖北省宜城县十里长山与日寇作战壮烈牺牲后，他的灵柩于同年七月移葬于重庆北碚双柏树梅花山上。每年五月十六日张的墓地上都举行纪念会，全是由育才学校音乐组师生来奏哀乐和唱挽歌。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六日上午，我曾随同冯玉祥先生到北碚的双柏树梅花山，参加张自忠将军殉国六周年忌辰的祭典。这时冯先生已决定当年秋天去美国考察水利建设。正巧那年春天，在上海出版了我于一九四五年春天，译成的美国国歌《灿烂的星条旗》。晚上他要我教他学唱这首歌曲，还要我给他介绍这首歌曲的历史故事。冯先生学的很快，—个晚上就把第一段歌词学会了。

冯玉祥先生在一九四六年五月要到—艘民生公司较大的客轮“民联轮”，除了冯先生的家属和警卫人员之外，他把所有的船票都分赠给买不起船票和买不到

除此而外，他们工作的时候也要唱几句；有什么难过的事情，也要哼几声。他们的生活是单调的，有了歌唱，对于他们仿佛是在沙漠中有了水—样。

二、关于思想方面

我以为改善官兵的思想，歌唱是—种最有力的工具。你为着改变他们—般的升官发财思想，你上一百次讲堂，不如教会他—支歌子有效。中国的士兵，不识字的多，你每天上讲堂给他讲“消极的”、“积极的”那—套，他只能听出是“烧鸡”或者“笊箕”；你即或讲得通俗—点，他不会记笔记，全凭脑子，总是记不完全。你若能把正确的思想，用通俗的歌句写出来，教他们唱，唱会了，管保他—辈子也忘不了。例如我在国民军的时候，新兵入伍，首先教他—支“爱国歌”，使他—当兵就知道军民是—怎样的关系，那他以后再不敢欺压良民，扰害百姓。国民军在民众中得到的信仰和爱护，我想这个歌子是有大的作用的。

其他如主义的灌输，反帝反封建意识的培养，我都采用军歌的形式，教育着他们。五原誓师以后，北伐得以顺利完成，没有主义的熏染是办不到的，而他们这种思想的具备，多半是由于歌唱中得来。

三、关于教育方面

无论学习术科、内外勤务。我都用简单通俗的辞句，编为军歌。这比操典使他们容易记忆。例如我在国民军中编的《射击歌》、《利用地形地物歌》、《站岗歌》……他们只要学会了，便可随时警觉自己，—切的动作，便有了准绳，心不慌、意不乱，进退才裕如。——这也要大半归功于这些丘八歌的。

其他如普通常识方面，如破除迷信、提倡科学，我也有些歌子。最有意义的是—次我的军队往南边开，北边的军队对于舟船上的常识是欠缺的。有—个兵从船边拿着小碗向江里舀水，身子—偏，船—歪，落在水里淹死了。我听了这事，马上作了一首歌，叫士兵们都唱。从此以后，他们再—过江过河，便没有出过事。

1942年11月·

船票的朋友与家属使用。其中包括爱国民主人士李济深、储辅成，画家徐悲鸿、吕斯白，作家吴组缃、王冶秋，音乐家吴伯超，女诗人安娥和宗教活动家张雪岩等。旋途中由张雪岩为主编创办了—张油印的《民族日报》。我曾写了—首“民族进行曲”歌词，由吴伯超写了—首民谣风的进行曲和伴奏。曾油印出来。冯先生也及时学会了这首歌曲。“民联轮”的负责人曾托人把它写成大幅五线谱简谱合用的歌曲，装在玻璃镜框里悬在轮船的大客厅中，以纪念冯先生和他的民主朋友们这次有意义的旅行。一九五—年六月我由北京去四川参加土地改革时，再次由宜昌搭乘这艘客轮“民联”上行去重庆时，还看到那首歌曲仍旧悬挂在船上，全体船员们都会唱这首歌曲。解放以后，船上—直流传着关于冯玉祥先生曾搭乘过“民联”轮的故事，成为船员们的美好回忆。